
工业企业改变领导作风
改革企业管理的经验



工人出版社

工业企业改变领导作风、改革
企业管理的经验

*
工人出版社编组、出版 (北京东四牌楼大街)
北京市公用事业局许可证字第009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40,000 印张:6 10/16 印数:1—10,000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4007·3
定价:160.55元

46711
18223

19947

19947

編 著 的 話

乍

整風運動以來，特別是党中央發出關於在全國各地各方面推行種試驗田的經驗後，各地工業企業的基層黨組織和領導幹部，在地方黨委的直接領導下，堅決轉變領導作風，改進工作方法，摸索辦試驗田的方法；同時依靠職工群眾，大膽改革企業管理工作，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經驗。為了滿足各地企業領導幹部系統地研究和學習其他地區企業先進經驗的需要，我們特將這段時間各地創造的經驗中，選擇經人民日報在社論或消息中向全國報道過的一些經驗，編成此書。本書材料，一部分選自人民日報和各地黨報，一部分是中共中央工業部供給的各地黨組織的報告，個別材料是我們直接向有關部門搜集的。

這些經驗已在不同範圍內開始推廣，推廣的情況證明：這些經驗對鞏固整風運動的成果，改進領導生產的方法，全面改進企業工作，促進生產大躍進，以及在企業里進一步創造性地發展和運用黨的群眾路線、貫徹黨的依靠工人階級办好企業的方針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關於這些經驗的特點和基本精神，關於學習和運用這些經驗應注意的問題，在我們收入的有關的人民日報或地方黨報的社論中，都有詳細的論述，我們這裡就不再贅述了。其中關於淮南礦整頓勞動組織的經驗，自今年四月九日經人民日報在消息中簡要報道後，已引起各地的注意。

他們這樣做，可以節省大量的勞動力，多快好省地實現生產大躍進；他們對精簡下來的人，也根據上述精神，按照他們的具體情況，作了認真負責的安排，使各有所歸。他們安排多余人員的方法，也是正確的，可貴的。所以我們收入了他們第一階段工作的總結。

目 录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 种試驗田的經驗的通知.....	1
种試驗田——又紅又專的道路..... “人民日报”社論	2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員會关于各級干部 种試驗田的報告.....	7
我們是怎样發動干部从根本上 轉變作風的..... 中共武汉國棉一厂委員會	16
我們是如何开始扭轉落后 局面的..... 中共武汉震寰紡織厂委員會	27
实行“跟班劳动”..... “人民日报”社論	45
天津市第二印染厂“跟班劳动”的經驗 和推广的情况..... 中共天津市委工业工作部	50
我們學習“跟班劳动”的几点体会... 中共天津針織厂委員會	60
工业中建立“試驗田”的新經驗..... “人民日报”社論	68
中共辽宁省委書記喻屏同志在 阜新現場會議上的總結發言.....	72

學習“試驗田”經驗改进領導作風	
的報告	中共阜新中央機修廠委員會 79
關於平安礦等企業領導幹部到工人住宅落戶與群眾	
同住同生活的情況報告	中共阜新市委委員會 93
平安礦三坑幹部參加生產領導生產	
的經驗	中共阜新平安礦三坑總支委員會 99
我們種“試驗田”的一些新的做法	
和体会	中共阜新中央機修廠委員會 110
改革企業管理工作的重大創舉	“人民日報”社論 114
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王鶴峰同志在省工業幹部現場	
會議上的總結發言	120
關於幹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和業務改革	
經驗的初步總結	中共黑龍江省國營 慶華工具廠委員會 134
我們是怎樣組織發動工人參加	
企業管理的	中共國營建華機械廠委員會 157
關於推行工人直接參加小組生產	
管理的經驗	中共哈爾濱市委國營工業部 172
一項重大的革新	“解放日報”社論 183
改變組織形式適應群眾和生產	
的需要	中共國棉二廠委員會書記 鄭凌秋 國棉二廠廠長 張明 188
關於整頓勞動組織工作的初步總結	淮南礦務局 198

中共中央關於在全國各地區各方面 普遍推行種試驗田的經驗的通知

中共中央決定把湖北省委關於各級幹部種試驗田的報告在報紙上公布，並且要求全黨各級組織加以討論，根據這個經驗改變自己的領導作風。

這個報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寫的，說的也只是同時種試驗田的若干縣中的一个縣即紅安縣的經驗。現在種試驗田的方法在湖北省已經比較盛行，其他省也有一些地方開始推廣這個方法，某些工業企業中的幹部也開始學習類似的工作方法。但是從整個來看，這個方法還遠遠沒有在全國普及，全黨認真討論一次紅安縣的經驗還有重大的迫切的意義。種試驗田是一種徹底克服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方法。它可以使幹部走上“又紅又專”的道路，實現政治和技術的統一。我們全黨的幹部必須實現政治和技術的統一，既不要作迷失方向的實際家，又不要作空頭政治家。因此，在全國各地區各方面普遍推廣種試驗田的經驗，是完成黨的整風任務的基本關鍵之一。除了從事農業工作的幹部應該普遍種試驗田以外，從事工業工作、交通運輸工作、財政貿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領導工作的同志，也應該認真研究種試驗田的方法，聯繫本身工作特點，得出必要結論，以便打掉官風，逐步達到又紅又專的目的。

中共中央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种試驗田——又紅又專的道路

“人民日报”社論

湖北省紅安縣高橋區的指導組長王樹昌和農場鄉支部書記鄧開志，有一次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檢查生產”，一位社員對着他們大罵：“搖搖擺擺，像个相公（意即少爷），不要把我們的田埂子踩壞了！”王樹昌問他：“你罵誰？”那位社員說：“我罵你！”王樹昌把这个情況告訴當時下鄉工作的縣委副書記張景田同志，張景田同志說，“罵的對！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參加生產、領導生產。”

是的，罵的對。“搖搖擺擺，像个相公”，這是農民對那些不能具體領導他們生產、只会站在旁邊指手划腳的干部的公正的評語。現在，王樹昌同志已經被農民們親熱地稱呼為“技術員”而不是“檢查官”了，因為他和紅安縣的其他許多干部一樣，亲自动手同技術人員和老農一道，種“試驗田”，具體地領導生產了。但是，在全國各地，在各行各業，從一般干部到高級的領導干部，不是還有許多人在“搖搖擺擺”嗎？

說“搖搖擺擺”，對於我們許多同志來說是不舒服的，難堪的，但卻是事實。我們有些干部，只願在機關里辦公，不願到下層去，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有些人即使到了下層，但仍然人到心不到，仍然是擺架子，指手划腳。對於這樣的干部，首先必須打掉搖搖擺擺的官風。不把官風打掉，我們就不可能像党中央和毛主席經常教導的那樣，成為人民群

众的亲密朋友，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也就不会真正把我們当成自己人，当成他們建設幸福生活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领导干部走出办公室，放下架子，和农民一样自己动手种庄稼，种試驗田或者叫做試驗地，是打掉官風的最有效办法。这是領導作風上的革命，具有極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紅安縣的許多干部，以前曾經是不願下乡，不願下田，人在乡下，心在城里，而在一年以来，經過种試驗田和其他一系列的措施，風氣却完全改变了，变得人在城里，心在乡下，人在社里，心在田里。这就是說，他們的思想感情，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了，他們和广大群众的精神隔閡消除了。几千年来，在旧社会中，当官的人都把劳动看成卑下的事情，我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告訴人民：劳动是光荣的事业。旧社会当官的都把自己看得比劳动者高一头，我們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訴人民：我們是和劳动者完全一样、完全平等的人。

走出办公室，种試驗田，不仅是領導作風的轉变，而且是領導方法的新創造。毛澤东同志曾經說过，“我們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項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結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結合。”紅安縣领导干部通过試驗，以自己的直接的实践，創造典型經驗，用这个經驗去领导和推动广泛的群众性的生产运动。这就一举而解决了个别与一般相结合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这两大問題。目前还有許多地方对生产的领导一般化，缺少深入的具体的指导，沒有創造和利用典型經驗，以推进全盤工作。在这样的地方，提倡领导干部同技术人員、有經驗的农民合作种試驗田，更有特別重大的意义。要知道只有深入下去，突破

一点，才能創造和總結出具體的生動的經驗，更有成效地指導一般地區的工作。今天，生產的規模日益擴大，生產內容日益複雜，生產技術需要步步革新。空洞的一般化的領導，不僅不能推進生產，有時候甚至會阻礙生產的發展。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積極推廣紅安等地的領導方法。

紅安縣領導干部自己動手種試驗田，是一個很好的領導方法，但它的意義遠不止於一般的領導方法的改進，它還有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意義。這是關係到在新形勢下我們廣大干部的努力方向的問題。

我們的干部隊伍中，有許多同志曾經歷了革命烽火的鍛煉，有比較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對社會主義事業是忠心耿耿的，也有領導群眾進行階級鬥爭的經驗。他們大都在各個不同崗位上負擔領導的責任，繼續領導着階級鬥爭，同時領導着偉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目前我國人民在一方面還需要繼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還需要繼續完成社會主義革命，並且還需要最後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都屬於階級鬥爭的範圍；但是在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却愈來愈成為我國人民的中心任務。我們還需要作艱巨的奮鬥，才能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領導干部熟悉的階級鬥爭的本領，有些快要閑起來了，而我們不熟悉的向自然界進行鬥爭的本領，則需要加緊學習。現在我們國家所急切需要的領導干部，就是完全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而又具有充分的業務知識來組織和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人，也就是說，需要“又紅又專”的領導干部。紅就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政治，專就是專門的業

務和技术。政治是統帥，是灵魂，是一切业务和技术的保証。不問政治，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反之，如果完全不懂业务，沒有相当的技术知識，也就会成为“空头政治家”，不能在实际上領導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設的事业。沒有一个强大的又紅又專的干部队伍，就决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事业。我們共产党人曾經用坚忍不拔的努力学会了阶级斗争的本領，因此把强大的敌人打败了；現在，我們同样要用坚忍不拔的努力学会向自然界作斗争的本領，学会搞經濟、搞建設，学会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識，由外行学成內行，這是我們中国共产党人目前所面对着的严重的历史性的任务。

領導干部种試驗田的重大的原則意义，在于這是我們許多領導干部走向又紅又專的道路。种試驗田，将使领导农业生产的同志們真正取得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知識，成为农业生产的內行，使他們能够成功地领导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这条道路，不仅是领导农业生产的同志的道路，而且也是所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达到又紅又專的道路。毛澤东同志在“實踐論”中說：“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参加变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在我們几十年来的革命斗争中，那一件成功的事情不是我們的领导干部亲身参加的呢？领导阶级斗争需要这样，领导生产斗争同样需要这样。领导干部种試驗田，不仅可以获得生产知識，使领导工作更加切合实际需要，大大减少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毛病，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增加生产的勇气和信心。現在有許多地区和許多部門的工作，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原因多半是因为领导干部开始真正鑽业务了，能够在业务上开始切实地领导工作了。但是也还有

許多同志並沒有真正鑽进去，老是在門外徘徊；或者是稍微學得一点，就自以为已經成了內行，不願再深入學習。這樣，他們的工作就进展很慢，老是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這些同志如果不痛切猛省，奮起直追，時代就會把他們远远拋在后面，他們原有的紅色也就会慢慢淡下去。

為了把種試驗田的方法推廣到全國一切農村工作者中去，并且進一步推廣到其他一切部門的領導工作者中去，還需要各地方各方面的同志進行創造性的努力。我們希望所有工礦企業的領導干部，及交通、財貿、文化、教育、衛生等方面的領導干部，都能走出辦公室，深入下層，都來仿效種試驗田的辦法，同勞動群眾和技術專家密切結合，認真學習必要的業務知識和技術知識，成為自己行業的無產階級專家，從而為我們黨和國家迅速地建立起一支強大的又紅又專的干部隊伍。

(1958年2月16日)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員会关于各級 干部种試驗田的報告

中央并各地、县委：

从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后，我省农村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这个转变，和干部下放、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有密切的关系。干部种试验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最近我省各县已经普遍地推行了这个办法，许多县在这方面有了显著的成效，开始从根本上改变着农村工作的面貌。以红安县为例：该县共有县、区、乡、社四级干部一千四百七十名，亲自动手搞试验田的有一千一百五十一名。其中有县委委员十四名，区委书記（指导組長）十七名，乡支部書記四十五名，社主任六百三十二名，共种了水稻试验田六百四十六亩，花生试验地四百七十六亩，还有棉花、红苕等作物的试验地。这些试验田的产量，都高于合作社一般田地的产量。县委委员、副县长蕭林山培育的两亩水稻试验田，获得了亩产水稻千斤的丰收纪录。七里区区委书記王作中的一亩花生试验地获得亩产一千一百九十斤的纪录。此外，还有皮棉亩产一百斤，红苕亩产一万斤的丰产纪录。在试验田的推动和影响之下，实现了大面积丰产。全县有三百一十三个粮食亩产一千斤的社，一百二十八个花生亩产八百斤的社，二十一个皮棉亩产

一百斤的社。全县十五种农作物样样丰收，全县七百三十二个合作社，社社增产。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八百零八斤，提前十年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指标。据红安县委报告，红安县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试验田的经过情形是这样：

“四多”和“三愿三不願”

1956年冬季以前，在县级机关里，流传着“四多”、“三愿三不願”的说法。所谓“四多”，就是“骑自行车的多，打篮球的多，穿大衣的多，吃食堂的多”。所谓“三愿三不願”就是“愿坐在屋里开会办公，不愿下乡领导生产；愿到先进社，不愿到落后社；愿和乡、社干部打交道，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县委委员十八人，经常下乡的只有三人，至多不过七人。有些县级机关的领导干部，缺乏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的观点，按时上班，照例休假，给农民增加了很多麻烦和不便，农民群众很不满意。例如两道乡乡长为了到县邮电局交涉架设电话线的问题，在外边等了个把钟头，无人理会，说是“没有时间”，等到“有时间”，又说，“下班了”，乡长很是恼火。所以，在以后，邮局干部到两道乡去找他了解有关业务情况的时候，他也说，“没有时间”。邮局干部等了一会又找他，他也说，“我下班了！”两道乡乡长的这种戏剧性的报复行为，反映了农民对于县级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满情绪。有些县级机关的领导干部不愿下乡，有的甚至即使“被迫”下乡，也是“人在乡下，心在城里”。例如税务局局长张福下乡才三天，就向乡干部说，“我要回到城里去剃头。”乡干部说，“我们给你找个好剃头师傅。”他说，“我要回到城里去洗澡。”乡干部说，“我们给你找个好洗澡盆。”他说，“我

要回到城里去換衣服。”……就这样，騎着自行車溜回去了。由于上面領導的不深入，不具体，下面干部也照样學。从上到下，都習慣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問題。“會議多”的現象又出現了。永何乡支部書記陳开和一个月开了二十八天的会，影响得那个乡的劳动出勤率只达到60%。許多干部不安心农村工作，認為在农村工作“沒有前途”，因而在工作中深入不下去。金牛区的工作員張汉兴，工作消極，好吃、好穿、好玩、好睡，在南台乡工作九个月，住了十四个社，社社都不欢迎他。前程社社員給他編了一首順口溜：“張汉兴，不成人，白天光睡覺，夜晚熬死人。”許多合作社无人过問。桐柏乡联盟二社連年減产，該社駐社干部副區長韓維，就是一个所謂“挂名办社”的人，1956年这一年，是合作化的第一年，大家都缺乏办社經驗，这是事实。但是，領導的不深入，不具体，一部分干部不安心农村工作，不热心办社，也是事实。因此，这一年，全县的合作社当中，減产社占10.7%，增产很少(5%—10%)的社占30%。

下放干部，表揚模范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的教育和鼓舞之下，县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的措施，改善領導，改进工作。主要的措施是精簡上層，下放干部。派了十五个較强的区委干部，担任了十五个落后乡的总支書記，派了一百九十五个較强的区乡干部，担任了一百七十六个落后社的领导干部，并且采取了層層下放，長期固定在一个社里包工包产的办法。抽調了一百七十六名优秀的机关干部和八十七名乡干部，加强社的领导，又抽調了一千二百四十名社干部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对于所有下放到乡、社、队的干部，

提出了長期負責到底的要求。鑒于有些干部是“人下放了，思想還沒有下放”的情況，在全体干部中發動了一次对于先进人物模范事迹的討論。这些先进人物如要求下放，回乡积极办社的乡总支書記黎海清；大公无私，舍己为社的社主任江藤荣；大胆革新，不怕困难的社主任辛时龙；艰苦办社，变落后社为先进社的乡長汪遵湯；艰苦深入，团结帮助乡干部的机关下放干部叶敦文；模范烈士家屬徐大媽等同志的模范事迹，对于广大干部，起了深刻的教育作用。例如原来对于“下放”頗有抵触的下放干部陈洪国在参加了这次討論之后，檢討了自己的錯誤思想，决心在十里乡中心社干一辈子。經過干部下放和开展了这次討論之后，不仅社社有人負責，而且大大地激發了干部办合作社的积极性和責任感。占店乡支部副書記黃成中过去东跑西走，早出晚归。自从固定駐社以后，三个月沒有回家一次。社員說他“去年当老婆的衛士，今年做了人民的勤務員”。

參加生产，領導生产

在干部下放的同时，县委強調了干部参加生产，領導生产，县委十八个委員中，經常下乡的十四人，县级机关干部，輪流下乡，短期下放，县委办公室也搬到重点乡去了。但是，有些同志虽然下了乡，工作还是深入不下去。曾經三次申請調离农村的高桥区指导組長王树昌和农場乡支部書記邓开志，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檢查生产”，一个社員对他俩大声叫罵：“娘卖瘟的，搖搖摆摆，像个相公(少爷)，莫把我們的田埂子踩坍了！”王树昌問：“你罵誰？”那个社員說，“我罵你！”王树昌把这个情况向当时在乡下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張景田同志反映。張景田同志說，“罵的对！这是因为我們沒

有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張景田同志向这个区的干部講了这件事，号召这个区的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他本人带头花了一塊多錢买了一把鋤头。在他的影响下，全区干部每人都买了一把鋤头。不久，全县农村干部一万零九百二十五人中，有97%的人自备了鋤头、镰刀和劳动手册，参加了生产。县委組織部長潘知在八里乡万兴社白天帮助社里犁田、送粪，夜里帮助社里搞包工包产。社員夸奖他是“文武双全”。广大干部参加生产之后，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对于当时生产起了推动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新的問題：干部在参加社的生产的时候，往往被分派到和妇女、小孩在一塊干些輕活，不容易了解情况，發現問題。有的干部虽然担任了主要劳动，也是由于成天参加生产，忽視了领导生产，不了解全面情况，就很难系統地总结經驗，指导全面。例如張店乡副乡長熊傳毓在星光社干了三天农活，开会时，一点情况也談不出来。他很苦恼地說：“这是搞的么名堂，累的腰酸背脹，工作还没有做好！”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許多干部都有着熊傳毓的那种苦恼。看来光是一个人一把鋤头，参加生产，还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怎么办呢？

种了試驗田，实现了具体領導

县委第一書記程鵬和农村工作部長庫崇德在县委重点乡杏花乡建苏社摸索到了一条經驗，这就是用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試驗田的办法，可以更好地做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1957年三月間，正是花生播种的时候，程鵬和区技术站長祝翼宏一塊在建苏社五峰崗生产队選擇了一亩地作为花